

新史學

九十年

—一九〇〇—

下 冊

許冠三著

本書分四卷十章及附錄一、二，接《新史學九十年》上册，由第九章起論述李大釗、朱謙之、常乃惠、雷海宗，以及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等之史觀學派理論與成果；進而至第七卷殷海光之科際整合及許冠三之多元史絡分析方法，指出史學之新路向。第八卷之附錄一、附錄二則分別論析台灣及中國本土史學之發展趨勢。各章均一再顯示作者之文筆精約，運思深微，立論公允，為近年來史學著作所僅見。

「《新史學九十年》從梁啟超的〈存真史、現活態、為生人〉始，下及王國維的〈以通人之資成專家之業〉；傅斯年的〈史學本是史料學〉、李大釗的〈經濟構造決定精神構造〉；朱謙之的〈心智因素重於物質因素〉，等等，確是抓住了每個學派的每位史家的史學新義。……特別是第六卷專記史觀派唯物家時，揭出郭沫若的『中國社會應與他國無異』，翦伯贊的『研究歷史須從實際出發』，和范文瀾的『不能削中國之足適西歐之履』，真是慧眼燭照之論。」

（吳澤，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翦伯贊篇 「《九十年》對郭、翦、范三位先生史學實踐的比較研究很有深度，給讀者以很大啟發。在翦伯贊史學『主骨』的『探蹟甄擇』上，取得很大突破。」

（姜義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郭沫若篇 「此稿對郭氏史學成就的評論，不失為平允之作。」

（宋唏，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關於郭老的評論……是堪稱公允的。」

（吳澤教授。）

殷海光篇 「許教授掌握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幾個主流，分析透徹，見解卓越。」

（鮑家麟，前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任教於亞利桑那大學東方系。）

朱謙之篇 「本章分析透徹，評論中肯。……以『心智因素重於物質因素』標題，甚為允當。」

（杜維運，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常乃惠篇 「許著既概述中外生物社會史觀之在中國，又詳明常氏之理論，確是博覽而精約之佳作。」

（謝澄平，薩克拉門多加州大學名譽教授。）

本土史學篇 「作者以簡練的文筆，敏銳的眼光，給世人展現了這些年來我國史學之各領域發展變化的主要面貌與基本趨向。……堪稱全局在胸，洞見細微。」

（姜義華教授。）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428-3

新史學

九十年

—一九〇〇—

下 冊

許冠三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學 198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428-3 (平裝)
962-201-427-5 (精裝)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騰步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好景工業大廈

目 錄

卷五 史觀學派(上)	1
第九章 李大釗：經濟構造決定精神構造	7
第十章 朱謙之：心智因素重於物質因素	21
第十一章 常乃惠：生物法則支配一切	41
第十二章 雷海宗：中國文化即將進入新生命周	59
卷六 史觀學派(下)	75
第十三章 郭沫若：中國社會應與他國無異	81
第十四章 翦伯贊：研究歷史須從實際出發	115
第十五章 范文瀾：不能削中國之足適西歐之履	145
卷七 史建學派	161
第十六章 先行諸賢：方法、材料、理論相須相成	167
第十七章 殷海光：走科際整合的路	191
第十八章 許冠三：由多元史絡分析着手	207
卷八 附錄	239
附錄一 三十五年(1950-1985)來的台灣史界變遷	241
附錄二 正在尋求自我的本土史學	275
後記	327
上册目錄	329

卷五

史觀學派（上）

提要

本卷述論由李大釗的經濟史觀開篇，然後依次為朱謙之的智識、社會史觀，常乃惠的生物（社會）史觀與雷海宗、林同濟的文化形態觀。各家試圖闡明並持以解釋歷史變動的原理原則雖彼此殊異，互有牴牾，但四者無不認定，歷史研究須以說明歷史演變、文化興衰為要務；須以尋求社會變革的原動力與常規為主旨，不當僅僅滿足於個別史事的攷證與因果連鎖的探索。

史觀學派亦發源於北京大學，創始人是新文化運動的左翼領袖之一的李大釗（1889－1927），代表作有《史學思想史講義》（1920－）和《史學要論》（1924）以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1920年前後，李氏雖因首先系統譯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惹了官非，然細攷其所述所聞，實質上不過是一種經濟決定論，一種生產力決定社會組織、經濟構造（生產關係）決定精神構造（政治、法制、倫理、哲學，等等）的機械觀。他自己並不諱言，他心目中的歷史唯物論實即經濟史觀。故長期以來不被中共官方視為正宗。

他從不曾像郭沫若那樣誤以史的唯物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他甚至公然指出，在生產力決定論和階級鬥爭說之間實有難以統一的矛盾，後出的調和論亦難以自圓。李大釗經常以「階級競爭」一詞代「階級鬥爭」，這表示他顯然不喜歡「階級鬥爭」這個概念。再則，他也不接受富定命色彩的五階段社會進化程式，更不認為從經濟關係上說明精神構造的變化，乃是解釋歷史演化、社會

變革的「唯一的科學」法門，他所以高估孔道西(Condorcet)、桑西門(Saint-Simon)和孔德(A. Comte)等人尋求歷史演變理法的成就，又特別抬舉馬克思的貢獻，誤認他的經濟決定論是「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的同等地位」的學理，多半是由於科學迷思的作祟。其實，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早已確鑿證明，非但馬克思未曾發現性質等同自然科學法則的歷史變革原理，而且歷史學也不可能發展成為性質類同自然科學的科學。

李氏守常的史學興趣，事實上並不以推廣經濟史觀自限。他也曾嘗試按實證主義思模編織一歷史科學系統，下層是記述史學，上層是理論史學。然則，最富反諷意味的，是他的史學思想深處始終有一二元論的精靈在作怪。他一方面相信，實證主義型的含蓋一切的歷史科學系統終有建成之日；另一方面，他又順相對主義的理路強調，歷史真實乃一變動不居的流體，不但因歷史本身的生動無已而變化，亦隨人類的歷史紀錄和解喻的與時俱改而更新。歷史真實既然如此無常，史家又焉能求得永恆的鐵定法則？從而建立其一成不變的歷史科學系統？

從今日專業史家公認的原理看，《要論》中的要論，首推有關「實在的過去」與「歷史的過去」之斷案，有關「實在的事實」與「歷史的事實」之分判。《要論》嘗指出，「歷史的真實」應有雙重指義：一喻「紀錄正確的真實」；二指「解喻正確的真實」；須二者俱備的真實，始得視為完全的歷史真實。其次，是它提倡「活史學」，奉勸現代史家宜用神於「永遠生動無已」、「沒有終結」的活歷史，不應但於故紙堆中討生計。此外，不可不書的，是《要論》已察及從事史學理論反省與批評之新式歷史哲學的價值和遠景。

自號「閔狂」的朱謙之(1899-1972)是「五四」前後北京大學的名學生之一，知名度之高不亞於傅斯年、羅家倫。他先因堅持不要文憑不參加攷試名噪北京，隨後又因起草〈中國無政府革命計

劃書〉及自首入獄而聞名全國。他的徹底革命言論也曾吸引過「靈魂搜索」時期的毛澤東。這位一度高唱「宇宙革命」，認為非至「大地沉平」算不得「根本解決」的「左海恨人」，自出入紅樓時代即識詆李大釗，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嗣後更憑借生命哲學與實證哲學以批判歷史唯物論。執教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後，又在「黑格爾主義與孔德主義結合的基礎上」搞出一套「文化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然細析謙之三十歲以後之作，明眼人皆不難察覺，直到抗日聖戰爆發為止，他始終未能擺脫李大釗二元論陰影的糾纏，概念與思路的混雜且有過之無不及。

謙之的歷史理論按性質可分兩大類。類一多言歷史演化和社會變革的原理，以及理解上述變動所用的原則與方法；類二多論史學界說，治史的宗旨、方法與意義。就其興趣所集中的第一類述作看，他的見解曾有三變。先是《歷史哲學》以新生機主義與孔德的實證學說湊合，專從知識線上的進化論歷史社會的發展，盛言生命的自主性、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文明進化的目的性，以為只有與生俱來的「生機力」才是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才是歷史演進的「根本的最終的基礎。」留學日本歸國(1931)後，謙之反唯物史觀的策略，乃由以往的正面對抗一改而為迂迴包抄，倡言攷察歷史演化，當兼顧物理、心理兩面，且須以心理為主。因為社會愈進步，心理因素的影響就愈大。史家如不重「心理法則」，就不可能正確理解高度文明的社會，更不可能「直接體驗歷史生命的活躍。」另一方面，他又以孔德的進化三階段論為準，將突出物質條件的唯物史觀與強調心靈因素的智識史觀並列為「實證科學階段」的「兩大思潮」。雖然，他追隨孔德的立場卻絲毫未見動搖。及至移席廣州，復嘗試以孔德的縱線進化觀與黑格爾的迴環進化說配合，由前者以觀歷史進化的常態和生理，由後者及辯證唯物論以察社會變遷的變態和病理。

相應地，在方法論上亦開始主張以孔德的實證思模與黑格爾的

辯證思模結合運用。稍後，又借用德國智識社會學者宣勒爾（Max Scheler, 1875 - ?）的學說去補充孔德的智識進化論，指出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和實驗科學的三種思攷方式，非只是標誌人類心智發展三階段的特徵，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中經常並存的「三種不同的認識形式」。

總之，朱謙之所信持的歷史觀始終是以孔德的思維方式進化論為骨幹。其他的學說只不過作為配搭和陪襯，或擴充三階段進化法則的原料。

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國人已知有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惟非至常乃惠（1897 - 1946）的《生物史觀與社會》成書，中國並無專以生物學原理論社會進化的述作。常氏立意營造生物史觀始於日本侵華益急的三十年代初，大旨在講求社會進化原由生物法則支配的學理，闡釋國族興衰取決於集團競爭成敗之道；用以對抗煽動階級鬥爭、分裂國家的辯證唯物史觀，並喚醒國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愛國意識。

社會達爾文主義首先認定人類社會乃一「有機實體」，是「生物進化綫上一個必要的階段」，其「結合中心」在生物的血緣關係，其前進的「原動力」，從根本上說，在生物求生存的本性。故人類社會進化的軌式莫不「受生物法則的支配。」與唯物史觀依經濟關係劃分歷史發展為原始共產、奴隸、封建、資本與社會主義五期遙遙相對，生物史觀則以社會組織為準，分社會進化為家族、部族、民族和國族四階段；認為驅使其升進不已的「主要原動力」，實來自作為「有機實體」的「社會自身」，入民族階段以後，規範整個社會組織和型態的「原動力」，則在由歷史文化長期薰習而成的民族性或國民性。相反的，社會的衰亂死亡，則原於「社會環境」與「社會動勢」矛盾所導致的動勢萎縮。所謂「動勢」，即一社會「向四周環境發展的主動傾勢」，亦即該社會集體生命力的表現。四十年代以後，

他亦同意文化形態觀的生命周期論，認為民族乃至國族亦有少、壯、衰、老這樣的「有機生長過程，」少壯時勢能旺盛，及至中年乃開始萎縮，到生命「動勢」完全消失之日，亦即該文化歸於滅亡之期。為此一張一弛，便構成社會生命的一個循環，文化生命的一個周期，而當時的中國正在步入第四個新的文化生命周期。

曾在大學講授歷史哲學多年的常燕生還指出，唯物史觀一派人，但以「家庭不過是一個經濟的最小單位，」因而不能解釋何以「家長終日辛苦奔波，賺錢以養子女？」又這一派人祇知「一個個的物質是實在的，而不知組織也是實在的，」是可以改變事物性質的，是可以產生新物質的。他對歷史唯物論者最有意義的理論挑戰，是問：即使我們承認馬克思派的說法，以為生產工具和技術、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都是社會演化的原動力，它們又是怎樣發展出來的？「蒸汽機會自己從石頭裏跳出來嗎？」這確是生產力決定論或經濟史觀的邏輯啞穴。

然生物史觀亦有它本身的致命弱點。即誤以比論代實證；在作人類社會為一「有機實體」論斷時，又只見自然有機個體與人類社會集體之間的類似，而不見其差異。雖然，生物學說有功於理解社會現象、說明歷史變動的看法，如今已是不爭之論。而且，由社會有機說發展出的系統論在西方正方興未艾。

文化形態史觀始入中國在二十年代初，先是俞頌華介紹德國文化形態學研究會，繼則張蔭麟譯述德人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沉淪》（或譯《西方的衰落》），續有張君勱詳介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歷史之研究》。惟須待二十年後，方抗日聖戰進入黎明前黑暗的階段，才因雷海宗、林同濟等《戰國策》一派人的及時鼓吹而引起文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連常乃惠、朱謙之也跟着講論文化生命周期，一致同意雷海宗中國文化獨具兩個以上生命周期的論斷，深信中國文化正處於「結束舊局面」「開創新世界」

的重生時刻。

雷、林兩教授同時祖述斯賓格勒和湯恩比，但取舍有顯著差異。與林氏的縱橫家取向大別，雷海宗頗重學術思想，故旨意深遠而多創新。據他的省察，在現存各大文化系統中，除開最年輕的俄羅斯文化，唯一未步入老年的，只有仍在戰國階段的西方。雖然，它已發展「至開始下落的時期。」至於中國文化，正由第二生命週期進入第三生命週期，就像木本花一樣「今年開放，明年可再重開，若善自培植，可以無限的延長生命。」因此，他預言，而今而後，西洋文化的學術思想雖仍可在中國引起波動，但對中國的影響力勢將日漸降低，其主動力亦將日趨薄弱。

朱謙之亦取第三生命週期說，且確指這第三次來復在抗戰爆發之年（1937）已經開始。他又按孔德智識進化公式立論，定第一周為黃河流域的宗教文化期，第二周為長江流域的哲學文化期，第三周為珠江流域的科學文化期。常乃惠的看法又不同，他以為中國文化已經歷了三次生命來復，目前正處於第四次來復的初春季節，相信「盛夏即將在今後一世紀中到來。」

五十年代以後，湯因比的一家之言，則因于平凡、鍾建閔的譯述，張貴永、王德昭和胡秋原等人的闡釋而在香港、台灣廣為流傳。

第九章

李大釗：經濟構造決定精神構造

一

以首先系統述論馬克思經濟史觀而成爲史觀學派前鋒的李大釗，其實並非最早介紹馬克思其人其言給國人的學者。¹ 他與中國現代史學的交涉亦不以此爲限。在北大執教期中，他還有計劃地譯介過從韋柯（G. Vico, 1668-1744）直至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近代西方史學思想，並在無意中揭穿了「實在的過去」與「歷史的過去」之間的千古秘密，道破了「歷史的真實」之本質及其日新月異的由來。

從主編《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² 和開闢北京《晨報副鐫》的《馬克思研究》專欄起，³ 直到1924年因國共合一而

1 1902年，梁啟超曾在〈進化論革命者之學說〉（《新民叢報》第十八號。）提及麥喀士（即馬克思），說他是「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又引頡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的議論說：「今之德國有最佔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爲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爲多數之劣者所鉗制。」1906年，龔仲（朱執信）撰〈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了馬克思和拉薩爾的生平和思想，並且節譯了〈共產黨宣言〉。（《民報》，第二、第三號。）1908年，民鳴節譯恩格斯所撰的英文本〈共產黨宣言〉序。（《天義報》，第十五期。）

2 《新青年》月刊，六：五，1919年五月。

3 《晨報副鐫》1919年五月五日起。由是日起連載四日的淵泉所譯的河上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李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論唯物史觀部分頗爲類似，疑淵泉即李氏本人。

忙於黨務的短短五年之中，他所譯寫的說明、應用或鼓吹歷史唯物論的文字共達十餘萬言。在舉世聞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⁴以外，涉及他後來亦稱之為經濟史觀的較重要文字尚有：

- (1) 〈階級競爭與互助〉；⁵
- (2) 〈再論問題與主義〉；⁶
- (3)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以上1919）；⁷
- (4) 〈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⁸
- (5)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以上1920）；⁹
- (6) 〈聖西門的歷史觀〉；¹⁰
- (7) 〈研究歷史的任務〉（以上1923）。¹¹

專書則有可稱為「第一本新史學理論」的《史學要論》（1924），以及直到近年才完全刊行的《史學思想史講義》（1920—？）。¹²二者皆是他在北大歷史系講授有關課程所用的教材。¹³此外，他還利用兼課和演講的機會在北京、上海若干大學的講堂中宣揚史觀，特別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上的重要性。¹⁴是以，時人但尊

4 原載《新青年》月刊，六：五、六。

5 《每周評論》，二九，1919，七、六。

6 《每周評論》，三五，1919，八、十七。

7 《新潮》，二：二，1919，十二、一。

8 《新青年》，七：二，1920，一、一。

9 《新青年》，八：四，1920，十二、一。

10 《社會科學季刊》，一：四，1923，八月。

11 《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3，十一、二九。

12 見《李大釗史學論集》五至十五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據葉桂生先生函，1987，二、十七。

13 吳家林，〈李大釗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習與研究》，1981，一；葉桂生，〈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中國史研究》季刊，1979：四。而《史學要論》一書，據朱謙之說，「大部分」皆本於內田銀藏的《史學理論》。說見《歷史哲學大綱》，二三，上海民智書局，1933；〈歷史科學論〉，《現代史學》，二：三，廣州，1935。又金毓黻，〈李大釗與五四運動〉，《觀察》，六：十三，1950。

14 吳家林，前文。

李氏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或視之為「中國早期的唯物歷史科學家，」¹⁵而不奉之為中國唯物史觀派的開山。

不過，當時喜歡弄弄李式唯物史觀的文人、學者和論客，為數實在不少。在他之外，這當中還有日後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廖仲愷、朱執信，和右派中堅戴傳賢（季陶）、胡漢民，以及三十年代起倡生物史觀以抵制唯物史觀的青年黨理論家常乃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問世不久，戴、胡二人就搶着以唯物史觀來攷察「中國的亂源，」研究中國的歷史和哲學了。¹⁶因應於胡氏的〈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¹⁷陳石孚趕忙譯出美國賽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經濟史觀》（*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由商務印書館作為《世界叢書》（1920）印行。叢書的主編陶履恭（孟和）親自校閱全書，並寫了一篇頗有學術水準的〈序言〉，肯定「馬克斯在社會科學上，特別是在歷史〔學〕上所建的大功」之餘，還推揚戴、胡的文字「都是有價值的討論，可以開中國歷史的經濟觀的先河。」與此同時，北京《晨報》和上海《民國日報》先後刊出譯自日文的〈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和〈唯物史觀的批評〉，¹⁸中華

15 葉桂生，前引文。朱仲玉，〈1919至1949年間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李潤著，〈李大釗同志對中國史學的巨大貢獻〉，《史學史研究》，1981：三、四。范文瀾、王亞南，〈中國早期的唯物史科學家－李大釗同志〉，《人民日報》，1949，四、二八。

16 參看戴撰〈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上海《建設》月刊（國民黨機關刊物），一：二；胡撰〈孟子與社會主義〉、〈中國哲學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階級與道德學說〉以及〈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一欄中的文字，《建設》，一：一、三、四、五、六期，二：一、五。（1919，八－十二月，1920，一、二、三、六月）。胡適之的〈井田辨〉（前刊，二：一、二、五。又見亞東版《胡適文存》，1921。）便是針對胡漢民的議論而作。

17 〈批評之批評〉原刊於《建設》一：五，嗣經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轉載。陳石孚的《經濟史觀》曾間中採用胡漢民此文的譯語，說見〈譯者綴語〉。

18 《晨報》，1919，五月五－八日，七月二五－八月五日；《民國日報》，1919，七月二一－四、二六、二九－三十一日，八月一－九日。

書局印行了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¹⁹ 北京《國民雜誌》發表了常乃惠由英文譯出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²⁰ 而戴、胡等人的言論又回過來鼓舞了李大釗，促他繼續寫出〈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和〈原人社會於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²¹

二

李大釗所稱述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無論用任何準繩量度，決不若五十年代後某些後進所預設的那麼純正。先出的文字固然是以批判眼光看馬氏學說，即令是做了共產黨員以後的述作，也從不曾視歷史唯物論為金科玉律。甚至可以說，他的觀點一開始就有「修正主義」傾向。〈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雖一再肯定唯物史觀的「特別發現」和「時代價值」，但亦坦然直陳它的時代局限，不贊成拿「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並且責備「馬氏本人忘了此點。」²² 他顯然不喜歡「階級鬥爭」之說。在先他總是以「競爭」代「鬥爭」，直到1922年三月的〈黃、龐流血記序〉才直說：「以前的歷史，幾乎（旁圈是作者所加，以下同。）全是階級的爭鬥史，」而「最後的階級爭戰，在世界在中國均已開始了。」²³ 像許多非難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一樣，他也認為生產力決定論和階級鬥爭說矛盾，另一些「自圓的說法，」亦同樣「有些牽強矛盾，」未能擺脫新出學說

19 1920年五月初版，至1936年八月已印行十四版。據曾勉之輯，〈李達著譯目錄〉（初稿），《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二輯，北京，1982。

20 《國民雜誌》二：二、三，1920年六、十月。

21 後文原為北大講義，見《李大釗選集》，三四一—五五，北京人民，1962。

22 《選集》，一九五。

23 此文原載北京《晨報》副刊，1922，三、二三。引文見《選集》，三八二。

難免的誇大。²⁴ 其次，就階級鬥爭論本身說，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他覺得，「團體行動、法律、財產法三個聯續法則，」雖不能「推翻馬氏唯物史觀的全體，」但能「補足階級競爭法則」的缺陷。²⁵ 是以，他力圖貶低階級鬥爭一義在唯物史觀系統中的重要性，並為馬克思開解，說：「與其說他的階級競爭說是他的唯物史觀的要素，不如說是對於過去歷史的一個應用，」因為馬克思「並非承認這階級競爭是與人類歷史相終始的，他只把他的階級競爭說應用於人類歷史的前史，不是通用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全體。」²⁶ 最令他「頭痛」而又無法辯解的，是階級鬥爭說之「抹煞一切」倫理的觀念，「因此建議循「新理想主義」的原則「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蔽。」在實踐上，主「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即「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因為「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²⁷ 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中，他重申「物心兩面」「靈肉一致」改造的主張，說：「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又謂：「我信人類不是爭鬥着、掠奪着生活的，總應該是互助着、友愛着生活的，」儘管他這時已相信，「這最後的階級競爭，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轍，〔是〕必須經過的、不可避免的。」²⁸

他非僅要修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且也不當它是說明歷史變遷的「唯一的科學」原理。在學術性較高的述論中，經濟史觀只不過是百家之一，而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功績，也不過與韋柯、孔道西

24 《選集》，一八九～九〇。

25 《選集》，一九一～三。

26 引文見《選集》，一八九。

27 《選集》，一九三～四。

28 原載《每周評論》，引文據《選集》，二二四～五。又〈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選集》，二三五～八。

(Antoine-Nicholas de Condorcet, 1743-94)、桑西門 (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孔德等在伯仲之間，同為意圖追求歷史變遷之「因果法則」，以企「躋後起的歷史學、社會學於科學之列」的學者之一。²⁹ 繼〈馬克思主義觀〉以孔道西（或譯康多塞）為「唯物史觀的開創者，」桑西門（或譯聖西門）為奠基人，狄利 (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米奈 (Francois Mignet, 1796-1884)、季佐 (Pierre G. Guizot, 1787-1874) 各有發舒之後，³⁰ 《史學思想史》復分別述論鮑丹 (Jean Bodin, 1530-96)、孟德斯鳩 (Charle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和韋柯的歷史思想，以及理愷爾特（或譯立卡兒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的歷史哲學。³¹ 跟着他又以八千字的長文譯述了「開拓唯物史觀道路」之桑西門的歷史學說、社會哲學和階級觀念，確認他並開孔德知識史觀和馬克思經濟史觀先河的歷史地位。緣桑西門早年受孔道西影響，深信歷史演化的動因在知識進步，途徑是「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政治。」繼承這一知識決定論而發揚光大的是孔德。及至法蘭西大革命爆發，二十五年中政治激變凡十次，但社會經濟生活並無可察的重大變化，從此桑西門乃改重經濟因子，認為「政治於社會，不過是第二義，」政治形式對人類生活並無「本質的意義；」「構成社會生活的根柢而決定歷史者，不是知識，不是宗教，亦不是那建築在知識上宗教上的政治，實是那致人類生活於可能的產業組織。」由是推廣，便構成了他的經濟決定論，相信「歷史過程，惟經由產業組織的變化纔能理解；將來的社會，亦惟依產

29 《選集》，二八八、二九四；《史學要論》，七、五五、六〇，上海商務，1924。

30 《選集》，一七八-九。

31 《選集》，四六八-七二。又《要論》，五五-八。